

智能资本时代的自然异化及其超越

——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

王雪竹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9日

摘要

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工智能加速替代和重组劳动, 似乎意味着人类正在告别以人口扩张、工厂生产和资源密集开发为特征的工业时代。然而, 人口减速并未自动带来自然压力的消退, 人工智能也没有使生产摆脱物质基础。相反, 资本借助算法、数据和算力基础设施, 把人的生活活动、知识能力和自然条件纳入新的价值增殖过程, 劳动异化与自然异化由可见的工厂形态转向更为分布式、隐蔽化和基础设施化的形态。本文首先界定“智能资本”这一核心范畴——它以算法模型、训练与行为数据、算力基础设施及社会共同知识为关键生产资料, 并通过与平台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的辨正, 在当代批判理论对话中确立其理论边界。在此基础上, 本文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理论原点, 阐释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感性对象性活动以及异化劳动的内在关联, 分析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如何转化为新的自然异化。本文认为, 生态矛盾的根源不能归结为人口数量或技术本身, 而在于生产目的仍由资本增殖所规定。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 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 这一命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意味着: 使技术、数据和算力摆脱私人增殖逻辑, 转化为缩短必要劳动、扩展人的自由能力并维护共同自然条件的社会力量。

关键词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智能资本, 平台资本主义, 监控资本主义, 自然异化

The Natural Alienation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Capital

—A Study Based on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Xuezhu W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cline in birth rate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eplacing and restructuring labor seem to indicate that humanity is bidding farewell to the industrial era characterized by population expansion, factory production, and resource intensive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population slowdown has not automatically led to a reduction in natural pressur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not freed production from its material foundation. On the contrary, capital utilizes algorithms, data, and computing power infrastructure to incorporate human life activities, knowledge abilities, and natural conditions into a new process of value appreciation. Labor alienation and natural alienation shift from visible factory forms to more distributed, concealed, and infrastructure based forms. This article first defines the core category of “intelligent capital”, which uses algorithmic models, training and behavioral data,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 common knowledge as key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establishes its theoretical boundaries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dialogue by distinguishing it from platform capitalism and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as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to explain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s the “inorganic body” of human beings, sensory objective activities, and alienated labor. It analyzes how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products, labor processes, class essenc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ransformed into a new natural alien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oot of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s cannot be attributed to population size or technology itself, but rather to the fact that production purposes are still determined by capital growth. Marx understood communism as the positive abandonment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alienated labor, which is the unity of “completed naturalism” and “completed humanitarianism”; This proposi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ans: freeing technology, data, and computing power from the logic of private proliferation, transforming them into social forces that shorten necessary labor, expand human freedom, and maintain common natural conditions.

Keywords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Intelligent Capital, Platform Capitalism, Monitoring Capitalism, Natural Alien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关于生态危机成因的常见解释中，人口增长经常被视为资源紧张和环境破坏的直接来源。如今，越来越多国家进入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阶段，这一事实似乎为一种乐观判断提供了依据：当人口不再快速增加，资源需求与环境压力也会自然下降；当人工智能提高生产效率并替代部分体力劳动，人类或许能够以更少的物质投入维持更高水平的生活。然而，这种判断把人与自然的矛盾还原为人口与资源之间的数量关系，也把技术效率误认为社会目的自动改变。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4》表明¹，全球生育率已经显著下降，部分国家的人口规模已经越过峰值，但世界总人口仍将在较长时期内增长，并预计

¹<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d/content/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24-summary-results-0>

在本世纪中后期达到峰值^[1]。更重要的是，即使人口规模下降，只要生产仍以资本积累而不是社会需要为目的，单位人口的能源吞吐、商品更新和基础设施扩张仍可能继续上升。人口减速可以改变需求的规模，却不能自行改变需求被生产和组织的方式。

人工智能同样制造了一种数字生产的“去物质化”表象。算法、模型和云服务通常以无形的信息产品出现，仿佛数字生产已经摆脱土地、能源和物质材料。但人工智能依赖数据中心、电网、芯片制造、冷却系统、通信网络以及持续更新的电子设备。国际能源署预计，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到2030年将增至约945太瓦时²，较当前水平翻倍，人工智能是增长的主要动力^[2]。与此同时，2022年全球电子废弃物产生量达到6200万吨，其中仅有22.3%的电子废弃物得到正式收集和环境无害化回收处理³ ^[3]。因而，所谓后工业时代并不是工业物质基础的消失，而是工业生产被重新组织、空间转移并由数字界面加以遮蔽。用户看到的是即时生成的文本和图像，背后却仍然存在矿物开采、设备制造、能源消耗和废弃物流。

如果仅以技术是否先进、人口是否减少来判断人与自然关系，就会错过马克思批判的真正对象。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没有把异化归因于机器或人的欲望，而是追问人的对象性活动为何会转化为反过来支配人的力量。劳动本来是人同自然建立现实联系并确证自身本质力量的活动；在私有财产支配下，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和社会关系却从劳动者那里分离出来，以资本的形式同劳动者相对立。由于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中介，劳动的异化同时意味着自然关系的异化。自然不再作为人的生命条件和共同世界存在，而被规定为可以计算、占有和投入价值增殖的对象^[4]。

现有研究已经从“无机身体”、感性对象性活动、异化劳动和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等方面，梳理了《手稿》中人与自然思想的基本结构。任玉倩的研究把客观自然、感性对象性关系、异化劳动与私有制以及共产主义和解作为主要线索；邹宝鑫则将其概括为本真统一、资本异化和扬弃私有财产后的解放状态，并特别注意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人口论的批判^[5] ^[6]。这些研究为理解《手稿》的生态意蕴提供了基础，但人工智能时代提出了新的问题：当劳动从机器节奏下的身体劳动转向算法评价下的认知劳动，当自然消耗被隐藏在算力基础设施和全球供应链之中，异化是否只是换了一副面孔？本文试图在《手稿》的概念结构与智能资本的现实形态之间建立联系，说明工业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异化既有历史差异，也共享同一资本逻辑，并由此重新理解马克思所谓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之谜的解答。

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与自然思想的理论溯源

2.1. 从黑格尔的对象化到现实劳动

马克思人与自然思想的形成，首先与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主体如何通过对象世界实现自身的问题相关。黑格尔把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理解为一个外化、对象化和扬弃的辩证过程。在《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中，劳动使奴隶延缓欲望的即时满足，通过改变对象而形成持久的自我意识。劳动由此不只是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而是主体把自身力量赋予对象并在对象中返回自身的生成过程^[7]。

这一洞见为马克思理解人同自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概念。人的能力并不是封闭地存在于主体内部，而必须以对象性的形式获得现实性。人建造房屋、耕种土地、制造工具，并非只是在自然物上添加外在形式，而是在对象世界中展开自己的需要、目的和社会能力。没有对象化，人的本质力量只能是一种抽象可能性。但是，黑格尔最终把现实劳动纳入精神自我认识的体系，自然和感性活动被处理为绝对精神展开的环节。对象化虽然得到承认，现实的劳动者及其物质条件却被思辨逻辑消解。

马克思的转变不在于拒绝对象化，而在于把对象化从精神的运动还原为现实人的感性活动。马克思的论述实际上区分了对象化与异化：对象化是人的生命活动获得现实形式的普遍条件，异化则是对象化

²<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and-ai>

³<https://www.itu.int/en/ITU-D/Environment/Pages/Publications/The-Global-E-Waste-Monitor-2024.aspx>

成果在特定社会关系中脱离主体并同主体相对立。正因如此，不能把人改造自然本身视为自然异化的根源。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人的对象性力量以资本、机器和制度的形式取得独立性，并把人和自然同时降为自身增殖的手段。这个区分也为分析人工智能奠定了尺度：模型、算法和自动化是社会知识的对象化，但当这些对象化成果被少数主体占有并用来支配劳动时，它们才成为异己力量。

2.2. 费尔巴哈的感性自然与马克思的实践超越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使自然和感性的人重新成为哲学的出发点。在他看来，自然并不是理念的外化，而是先于意识并构成人的现实基础；人也不是纯粹自我意识，而是有身体、有需要并依赖对象的自然存在物。这一立场直接启发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受动性和对象性的论述。人之所以是现实存在物，正在于他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对象；一个没有对象的存在物，也就没有现实的生命活动[8]。

费尔巴哈的限度在于，他主要从直观和感理解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作为被感知的对象恢复了优先地位，但人如何在历史中生产自己的生活条件、自然如何被社会关系中介，并没有得到充分说明。马克思把“感性”推进为“感性活动”，使自然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成为实践关系中的自然。土地、河流和矿物固然在人的活动之前就已存在，但它们以何种方式进入人的生活，取决于生产方式、所有制和社会需要。自然的客观性并未因此取消，反而通过人的受动性不断显示自身；只是对社会的人而言，自然总以历史形成的关系方式出现。

这种实践转向使马克思同时避免了两种片面性。自然不是主体任意塑造的材料，因为人的目的必须通过自然规律才能实现；人也不是自然因果链条中的消极环节，因为人能够通过共同劳动改变既有条件。人与自然既非抽象同一，也非外在对立，而是能动性、受动性相统一的对象性关系。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也不在于维护一个未被技术触碰的纯粹自然，而在于考察技术实践是否以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然再生产为界限。

2.3. 对国民经济学与人口理论的批判

国民经济学把劳动确立为财富的重要来源，却把私有财产、雇佣劳动和市场竞争当作自然前提。马克思接受了劳动在现代财富生产中的基础地位，同时把政治经济学没有追问的问题推向前台：劳动者为什么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失去财富，生产力为什么越发展越表现为支配劳动者的力量？《手稿》的异化劳动理论正是在这一矛盾中形成。它把工资、利润和私有财产背后的社会关系揭示出来，使人与自然问题不再停留于抽象自然观，而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人口论构成这一转变中值得重视的环节。马尔萨斯把贫困和资源紧张解释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自然结果，由此把历史形成的贫困关系转化为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马克思的批判则指向这种自然化操作：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从来不是脱离生产方式的纯数量关系。谁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生产以何种目的展开，社会财富如何分配，都会决定人口如何成为“过剩人口”。邹宝鑫的研究据此指出，马克思并不把人口问题理解为人与自然先验不相容，而是把它放回私有财产和社会需要的结构中[6]。

2.4. 从自然哲学到实践唯物主义的人与自然观

经过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形成了一种以对象性实践为核心的人与自然观。它既承认自然的先在性和客观规律，又把人的社会历史理解为自然存在物的能动实践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哲学之外的应用问题，而是理解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人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实现自身，社会也只有通过组织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才能存在。

福斯特在重构马克思生态思想时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把自然降为机械对象，而是包含关于自然历史、社会生产和物质变换的系统视野；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问题，应当从社会组织与自然再生产之间的断裂来理解[9]。虽然“物质变换裂缝”概念在马克思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但其哲学前提已经存在于《手稿》：当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发生异化，人的对象性力量不再受共同目的支配，人与自然的统一就以分裂和敌对的方式出现。

2.5. 智能资本：概念界定及其与平台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的辩证

本文所谓“智能资本”，是指资本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条件下呈现的一种特定形态：它以算法模型、训练与行为数据、算力基础设施及其知识产品为关键生产资料，通过自动化预测、生成和决策组织价值增殖，并把社会共同积累的知识、语言、注意力和生命时间转化为可占有的对象化力量。

斯尔尼塞克将平台资本主义概括为平台依托基础设施、中介位置和数据提取形成新的积累机制[10]。智能资本与其共享平台化和数据占有的基础，但本文更关注模型训练、算力集中及其生态物质基础，因而不仅解释资本“如何中介”，还追问这种中介如何重组人与自然的关系。祖博夫关于监控资本主义的分析揭示了以人类经验为原料、通过行为数据预测和塑造行为的资本逻辑[11]。智能资本继承这种数据提取机制，同时把自动化生产、芯片、数据中心、电网和冷却系统纳入价值增殖，使主体控制与自然消耗相互交织。

据此，智能资本的特殊性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生产资料上以模型、数据和算力为核心；积累方式上依靠对认知能力、预测能力和社会知识的垄断；生态后果上表现为能源、材料和设备更新的持续扩张。它与工业资本的技术形态不同，却仍延续资本对社会对象化力量的私人占有逻辑。

3. 《手稿》中人与自然思想的主要内涵

3.1. 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

马克思把自然称为人的“无机身体”，并非借助修辞强调环境的重要，而是对人的现实存在方式的规定。人的有机身体有明确边界，但人的现实生命不断越出这一边界，通过呼吸、饮食、生产、感知和交往同外部自然发生持续联系。自然既提供直接生活资料，也提供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植物、动物、空气、光和土地同时构成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对象[4]。因此，人不是站在自然之外的主宰者，而是依赖自然并以自然为自身延伸的对象性存在。

“无机身体”并不抹去人与自然的差异。动物也依赖自然，但人的普遍性在于能够把更广阔的自然界纳入有意识的活动，并按照对象的尺度改变对象。人的这种能力使自然成为历史世界，也使人的本质力量获得客观形态。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并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人在改变自然时发展自己的感官、知识和社会能力，自然则以人的生活世界的形式进入历史。若把人化理解为对自然的任意占有，就会丢失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受动性；若把自然保护理解为排除人的实践，又会把现实的人退回抽象旁观者的位置。

3.2. 感性对象性活动是人与自然统一的现实形式

劳动之所以成为人与自然的中介，并不只是因为它把原料变成产品，而在于它使人的生命活动获得对象性形式。劳动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本应使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世界中得到确证。因此，马克思并未将人与自然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单向支配关系。人的实践活动是在对象世界中展开的对象化过程：人通过劳动将自身的本质力量现实化于自然，同时又以自然的客观规定性和现实条件为基础。对象化因此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中介，而异化则表现为这一对象化过程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倒置。

这种理解可以解释技术的双重可能性。机器和人工智能都是社会知识与协作能力的对象化，它们能够扩大人的活动范围、减少重复劳动，并使人从直接自然强制中获得更大自由。技术并不天然与自然和人的本质相敌对。问题在于，对象化成果由谁占有、以何种目的使用。当机器成为资本的固定形态，社会知识不再作为共同能力属于劳动者，而以生产条件的所有者身份同劳动者相对立；人工智能也可能以同样方式把积累于无数劳动和生活活动中的知识，转化为平台所有者的专有资产。对象化由人的自我确证转变为异己力量，正是异化发生的节点。

3.3. 异化劳动造成主体、对象与社会关系的共同颠倒

《手稿》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和人与人的关系揭示异化劳动。劳动产品本应是人的能力在对象中的确认，却在私有制下归属于他人，成为资本积累和支配劳动者的手段；劳动活动本应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却成为维持生存的外在强制；人的普遍创造能力被压缩为出售劳动力的手段；人与人的共同活动则表现为所有者与无产者、竞争者与竞争者的关系。异化不是主观疏离感，而是一种客观社会结构：人的力量以物的形式独立起来，反过来规定人的活动。

自然异化正内含于这一结构。劳动产品由自然材料和人的活动共同形成，产品同劳动者分离，也意味着被改造的自然以私有财产和商品形式同劳动者分离。劳动过程由资本控制，自然的利用尺度便不再由共同需要和自然再生产决定，而由成本、利润和周转速度决定。类本质的异化使人失去与自然建立科学、审美和共同体关系的条件，自然被压缩为单一的有用性。人与人的异化又把自然占有转化为社会权力：控制土地、能源、平台和算力者，能够决定他人以何种方式接近自然和参与生产。

自然异化不是自然获得了意识并丧失自身，而是自然在人类社会关系中被赋予异己形式。它从人的共同生命条件变成排他性资产，从具有自身节律的生命系统变成可即时调度的投入品；由异化实践造成的环境后果又以灾害、污染和资源冲突的形式反过来约束人。主体试图通过资本无限控制对象，结果却被自己制造的对象性力量支配。

4. 人工智能时代与工业时代异化逻辑的比较

4.1. 不变的内核：资本对对象化力量的占有

工业资本与智能资本在技术形态上差异显著，但其异化逻辑具有连续性。二者都以劳动者同生产条件的分离为前提，使社会对象化力量以资本的形式归属于少数所有者。工业时代，机器、厂房和原料同工人相对立；智能时代，模型、数据、算力和平台规则同劳动者相对立。劳动者必须进入他人所有的技术体系才能获得生存资料，而技术体系的目的不是发展劳动者的能力，而是实现价值增殖。

技术由此表现出一种颠倒：它本来是社会知识和协作能力的结晶，却以独立主体的姿态决定人的劳动。在工业工厂中，机器速度规定身体动作；在算法平台中，系统指标规定认知节奏和行为选择。资本通过占有对象化成果，把过去劳动转化为控制现实劳动的力量。自然也被置于同一结构中：煤炭、石油、土地、电力、数据中心和频谱都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进入计算，其使用尺度首先服从回报率。

4.2. 控制方式的变化：从空间集中到分布式支配

工业资本的异化具有鲜明的可见性。工厂把工人、机器和原料集中在固定空间，纪律通过工时、监督和流水线实施，环境破坏则表现为烟尘、废水、矿坑和城市贫民区。智能资本的控制更为分布式。劳动可以发生在办公室、家庭、车辆和手机界面上，管理则由无处不在的数据采集和算法评价完成。劳动者表面拥有更大空间自由，却更难找到一个明确的支配中心。

这种分布式结构也改变了生态后果的可见方式。工业污染通常靠近生产现场，智能产业的环境负担

则沿着全球供应链分散：矿物在一地开采，芯片在另一地制造，模型在大型数据中心运行，设备在全球消费，废弃物又流向新的区域。消费者和知识劳动者与这些自然代价之间形成更长的距离。自然被抽象为云服务价格和算力指标，其具体地域、用水压力与能源结构从日常经验中消失。

4.3. 劳动对象的变化：从身体能力到认知与生命时间

工业资本主要直接组织身体劳动，虽然它同样需要知识和情感，但生产控制集中于动作、速度和工作日。智能资本则把认知、语言、情感和注意力更加系统地纳入生产。劳动者不仅出售规定时段内的劳动能力，还不断提供可用于训练、预测和优化的数据。工作与生活的界线因此变得模糊，人的生命时间本身成为价值化对象。

这种变化使类本质异化获得新的形态。机器曾把工人变为局部动作的执行人，人工智能可能把人的判断降为模型流程中的监督节点。人能够创造机器和模型，却日益按照模型的可计算标准理解自己。可量化的绩效、可预测的偏好和可生成的内容取代难以计量的经验、沉思和共同活动。人的普遍能力并未消失，而是以数据和模型能力的形式被外置并资本化。

4.4. 从“自然资源”到“自然 - 信息复合体”

工业资本把自然主要规定为原料和能源，智能资本在延续这一规定的同时，又把自然转化为可感知、可建模和可优化的数据对象。土地、交通、气候、生物和人的身体通过传感器与模型进入实时计算。这样的技术可以改善能源管理、灾害预警和资源利用，也可以把自然进一步置于所有权、监控和收益计算之下。自然不只是被开采，还被持续测量和预测。

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然异化不是工业异化的简单替代，而是其复合化。资本既直接消耗能源、材料和水，也通过信息控制重新组织自然利用。它能够把生态风险定价、把环境数据专有化、把绿色效率转化为新的投资领域。若社会目的不变，绿色技术甚至可能扩大资本对自然的控制范围。工业资本与智能资本的共同问题并非技术程度太高，而是技术理性缺乏共同体的目的规定。

5. 共产主义作为人工智能时代人与自然谜题的解答

5.1. 扬弃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实现对象化力量的复归

马克思在《手稿》中把共产主义规定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这里的“积极”意味着，共产主义不是把社会退回技术贫乏和需要匮乏的状态，也不是把一切对象化视为异化。它要扬弃的是人的对象性力量以私人财产形式同人相对立的社会关系，使积累起来的生产力重新成为社会成员共同支配的能力。人工智能由此不应被简单理解为资本主义的终极机器，也不应被浪漫地想象为自动通往自由的工具。它的解放潜能只有在其所有权、治理权和目的结构发生变化时才可能实现^[4]。

当模型、数据和算力被封闭为少数企业的专有资产，自动化节约的劳动时间会表现为失业风险、劳动强度提高和利润集中；当这些对象化能力被社会共同掌握，自动化才可能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使人从重复性任务中解放出来。自由时间不是消费市场之外的空白，而是人的能力、交往和感性得到发展的空间。共产主义的技术意义正在于把“节约劳动”从资本降低成本的手段，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扩展自由生命活动的条件。

5.2. 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称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4]。这并不是在自然价值与人的价值之间寻找折中，而是说明人的解放和自然关系的合理化具有同一根源。人道主义若脱离人

的自然存在，就会把自由理解为摆脱一切自然限制的无限支配；自然主义若脱离人的社会实践，则可能把自然保护理解为压抑人的需要和历史能力。完成了的统一要求人承认自身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受动性，同时以共同而自由的方式组织对象性活动。

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统一意味着以自然再生产和人的全面发展共同规定技术边界。算力是否扩张、数据中心如何布局、模型用于何种社会任务，不能只由资本回报决定，也不能只由抽象效率决定，而应由社会需要、生态承载和代际责任共同判断。对自然限制的承认不是反技术，而是把技术从盲目增长中解放出来，使其服务于减少无意义劳动、修复生态关系和提高公共生活质量。

5.3. 从私人算法权力到共同的社会智能

人工智能集中体现了社会知识的共同性质。模型能力来自长期积累的科学文化、公共教育、无数劳动者的知识贡献以及社会交往形成的数据。它却可以通过知识产权、平台壁垒和基础设施垄断转化为排他性权力。共产主义作为谜题的解答，不能只停留于对收益进行再分配，而要触及知识和技术的生产关系，使社会智能不再以外在力量支配其创造者。

共同掌握并不等于由一个抽象中心替所有人作决定。若算法治理缺少劳动者、社区和受生态影响群体的参与，公共所有也可能退化为新的技术官僚支配。真正的共同性要求生产者能够理解并参与决定技术目的，要求受数据和算法影响的人拥有知情、质疑和修改规则的能力，也要求自然成本不再被转嫁给边缘地区 and 未来世代。共同的社会智能必须同时是民主的、可解释的和生态负责的。

5.4. 从无限增殖转向真实需要与自由发展的生产

人口下降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能否改善，最终取决于社会是否摆脱无限增殖的强制。只要价值必须不断扩张，资本就会在需求不足时制造需求，在效率提高时扩大总量，在资源受限时寻找新的自然和社会领域。共产主义的根本变化，是把生产目的从价值增殖转向使用价值和人的真实需要。这里的真实需要并非由权威替个人规定的最低消费，而是摆脱广告操控、竞争性占有和身份消费之后，人的能力、关系和共同生活的丰富发展。

在这种生产逻辑中，生态尺度不再作为利润计算后的外部修正，而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内在条件。人工智能可以用于协调复杂生产、降低能源浪费、延长产品寿命和共享社会知识，但其使用应以减少必要劳动和物质浪费为尺度。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人与自然谜题的解答，不是因为它承诺一种无矛盾的技术天堂，而是因为它把矛盾的处理权从资本的自发运动交还给联合起来的社会成员，使人能够有意识地调节自己同自然的物质交换。

6. 结论

本文的分析表明，人口出生率下降与人工智能扩张所制造的“去物质化”和“去人口化”表象，并不足以改变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结构。人口减少只能改变需求规模，数字技术的无形外观也不能消除数据中心、芯片、电网和电子设备的物质基础。以《手稿》为理论原点可以看到：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劳动是人与自然联系的现实中介；当对象化成果以私有财产和资本形式同人相对立时，劳动异化同时表现为自然关系的异化。智能资本只是把这一结构从机器工厂延伸到数据、认知和生命时间，使自然异化进一步表现为能源、材料、算力和算法控制的复合过程。

因此，人工智能能否成为解放力量，关键不在技术本身，而在其所有权、治理权和生产目的。所谓“共同掌握”，应使模型、数据和算力等对象化成果服务于社会需要，使自动化节约的劳动时间转化为人的自由发展，并把自然再生产和代际责任纳入技术决策的内在尺度。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完成了

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统一的命题[4]，在人工智能时代仍意味着：只有扬弃以无限增殖为目的的异化关系，使社会成员能够有意识地组织自身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技术进步才可能同时转化为人的解放与自然关系的合理化。

参考文献

- [1] United Nations (2024)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 Summary of Results. <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public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24-summary-results>
- [2]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5) Energy and AI. <https://www.iea.org/reports/energy-and-ai>
- [3] ITU and UNITAR (2024) The Global E-Waste Monitor 2024. https://www.itu.int/pub/D-GEN-E_WASTE.01-2024
- [4]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09-248.
- [5] 任玉倩.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探析[D]: [硕士学位论文]. 牡丹江: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5.
- [6] 邹宝鑫.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4.
- [7]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8]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9]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M]. 刘仁胜, 肖峰,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10] 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 程水英,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11] 肖莎娜·祖博夫. 监控资本主义时代: 在权力新边界为人类未来而战[M]. 温泽元, 等,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1.